

温州金融生态透析

WENZHOU JINRONG SHENGTAI TOUXI

吴国联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温州金融生态透析

吴国联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金融生态透析/吴国联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8

ISBN 7-5426-2348-6

I. 温... II. 吴... III. 金融—研究—温州市
IV. F83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635 号

温州金融生态透析

主 编/吴国联

责任编辑/苏家珪

装帧设计/范峭青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70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4.5

印 数/1 3000

ISBN7-5426-2348-6

F·461 定价 48.00 元



2006年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莅临温州,就“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听取温州市中心支行吴国联行长的汇报



2006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莅临温州市中心支行指导工作



2004年11月4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
若谷莅临温州调研指导



2006年2月，浙
江省外汇管理工作会
议在温州召开



2004年8月26日，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
心支行行长周业樑莅
临温州调研指导



2006年6月，
中央党校“金融支持
新农村建设”调研
组来温州调研时
合影



2005年12月31日，
温州市市长刘奇到金融
机构亲切慰问一线员工。



2005年12月31日，
温州市常务副市长阮晖
到金融机构亲切慰问一
线员工。

2002年12月，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温州联合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2006年4月10日，中信银行温州分行举行向全市200家初创型、成长型企业综合授信20亿元暨首批100家企业签约仪式，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等出席会议

2006年5月12日，温州市召开银企合作项目推进会，全市金融机构共签约授信180亿元





2006年2月7日，
农行温州市分行“存款超500亿元新闻发布会”现场



在2005年“温州市
百强企业”授牌仪式
上，建行温州分行张俊
行长代表金融机构发言

温州市商业银行率先提出打造“民营企业主办银行”，先后举办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银企合作签约仪式





2005年9月“温州市金融生态宣传月”咨询活动现场



2005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温州市中心支局“文明服务宣传月”咨询活动现场



2005年6月5日，“青春央行”上海辖区青年职工英语大赛启动仪式在温州举行

中行“外汇宝
业务进社区”活动
现场



2005年2月25日，
全国首张以区域群体
命名的银行卡——中
信温州人卡诞生

2005年10月温州市
金融机构反假货币知识
竞赛现场





2006年4月23日
温州市农村反假协理员制度启动仪式会场



2005年10月中
国人民银行温州市
中心支行“金融知识
送下乡”活动现场



2006年5月温州
市农村信用社下乡开
展现场办贷活动

序

李 扬

从理论上说,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是认识到这一特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于2004年首次系统地将仿生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分析之中,系统阐发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运用它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性矛盾作了十分深入的分析。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中国金融界的广泛共识,并在全国引发了对金融生态问题的热烈讨论。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实施的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则对这一概念及其具体应用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过去20余年中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也取得了年均增长率高达9.6%的惊人成就。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政府强制推动的特点,国民经济的运行也表现出较强的政府主导的色彩。客观地说,选择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路径,是由特殊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且,由政府主导改革和发展,也为中国迅速地摆脱传统体制和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提供了比较有效的路径。但是,毋庸讳言,政府的全面干预,也给中国带来了法治不完善、诚信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不充分、保护主义盛行等一系列阻碍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因素。在这个意

义上,提出金融生态概念,并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针对的就是这种制度现状。

然而,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者们都注意到,在政府主导的总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重大差异,其中,浙江省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一直受到关注的“温州模式”,应当算是一个异数。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可以发现:驱动经济增长的居然是经济学教科书所列的那些正规因素:企业家精神、知识的增长与传播、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以及诚信文化等等。正因为如此,长久以来,温州经济一直被国内外学界视为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观测点,温州模式总是能在不同时期带给人们许多观念上的冲击。如果说,温州经济在过去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基于市场因素的自然发展而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范例,如今,当我们的视野深入到金融发展的层面时,我们发现,那里的金融实践也充满了启示。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以来,温州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这首先突出表现在两个指标上:一是资产利润率超过2%,二是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55%——这些指标都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浙江省也堪称翘楚。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在那里,以丰厚的民间资金为基础,民间借贷活动相当活跃,这不仅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和持续的金融支持,而且,通过与国有金融系统的相互配合,使得当地的企业获得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我们认为,正是正规金融与非正规的民间金融的相辅相成,形成了温州地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对我国291个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温州作为惟一的地市级城市被评为Ⅰ级城市。应当说,取得这个结果,绝非幸至。

近年来,关于温州模式特别是关于其企业发展和市场体系建设的研究,学界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取得了相当深入的成果,本文不拟赘述。作为金融研究者,我们更关心温州经济中那些有利于现代金融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和体制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形成温州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

温州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有着提

倡“功利”、“重商”的区域重商文化传统,这种“瓯越文化”有别于重义轻利、崇本抑末的传统儒家文化。据史书记载:早在万历、乾隆年间,温州人就“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万历《温州府志》卷5)、“人习机巧”、“民以力胜”(乾隆《温州府志》卷4)。从这种深厚的文化渊源中,我们不难找到当今温州人喜欢当小老板、偏好办个私企业的原因。从理论上说,从明朝开始形成的江浙文化传统中重工、重商、重教因素,与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非常相似;它天然适合于作为现代金融之核心的信用因素的成长。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夯实地区信用文化基石的积极效果。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歧视,我国的民营经济一直是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民营经济要想获得正规金融部门的支持,非有良好的技术基础、管理严密的企业组织、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信用记录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想获得正规金融体系的长期支持,它们必须长期、反复地证明自己拥有遵守信用纪律的优良记录和相当硬的预算约束。至于从非正规金融体系获得金融支持,情形也大致相仿。非正规金融资源的成本之高,使得只有那些绩效优良的企业才能厕身其间;而非正规金融的高度易变性,更要求那些希望长期取得金融支持的企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诚信品质。总之,由于民营企业获得各种类型金融支持的前提条件都是要建立并保持良好的诚信记录,在民营企业高度发达的温州地区,诚信文化自然就被提高到性命攸关的高度。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形成良好金融生态的关键因素,从而也是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此外,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也是促成现代金融经济高效运转的治理文化的关键催化剂。这一点,可以在“合会”这种具有典型性的温州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得到佐证。众所周知,由于现行法律并不承认“合会”这种非正规金融制度的安排,司法机构也不会为“合会”参与者提供司法救济,因而,“合会”的运转完全依赖其自我治理机制。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合会”制度,但“倒会”事件却屡屡爆出。相比而言,“倒会”现象在温州十分鲜见,因此,“合会”的规模稳步扩大,其影响力也日渐深远。这说明,温州地区不仅拥有良好的社会信

用环境,其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相当完善的。

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培育了温州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发达的商人自治组织。在欧洲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商人自治组织历来就是经济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它们左右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不待言,对于当地的政治动向也拥有相当的发言权,在中世纪后期直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欧洲的商团甚至拥有装备精良的武装。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身家百万的老板和高级企业管理人群体,但是,商人自治组织的发展却相当落后。腰缠万贯的商人们不仅无意形成自己的自治组织,而且以投靠官府、与各级官吏相勾结为能事,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政府欺压百姓的工具。历史上,孙中山先生不明此理,就曾于辛亥革命时期在广东组织过商团,拉起武装,企图与清政府抗衡。但由于缺乏商人自治的意识和传统,清政府稍加威胁利诱,商团武装便告土崩瓦解,终于留下一个现代的笑话。相反,在温州,我们看到,各种形式的民间商会、同业公会等中介组织相当健全,并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卓有成效的影响。我们认为,商会等民间自治组织的高度发达,也是保证温州市场经济持续健全发展的深厚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除了悠远的重商历史传承和民营经济的勃兴外,我以为,形成温州优良金融生态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政府的开明。在这一点上,温州也是得天独厚的。温州地处东部沿海,资源贫乏。出于战备的需要,1949年以来,那里一直就没有被国家摆放过值得一提的工业。或许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温州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隅;改革开放以后,这反而成就了其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天高皇帝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进而逐渐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不仅如此,与全国多数地区不同,温州的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基于这一路径,温州逐渐形成了被学界奉为市场经济圭臬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并在此格局下形成了相对健全的以家庭式私人企业为基础,以灵活的金融制度为支撑,以自发扩展之产业结构为依托的自由市场增长模式。

在哈耶克所推崇的这种市场解决、自发自生和自组织模式中,政

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主要发挥促进性、辅助性、倡导性和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的作用。所谓着眼于“促进”,固然体现在政府始终致力于创造并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更重要的是,当经济运行出现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现象因而需要公共力量参与解决时,政府采取的是与市场一致的过程政策,其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将尽可能避免扭曲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而致力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这就是说,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来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地破坏”,由以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政府的“公共企业家”的活动严格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是全部的精粹所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原则,在温州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

只有在上述制度环境中,金融活动才能获得自由、健康的发展空间。据温州入行的同志介绍,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不受行政干预,银行信贷投放能够完全遵循市场规则行事,那里很少出现如内地一些城市那样银行呆坏账大量沉淀而积重难返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州的金融业才能历尽劫难而不倒,其资金价格甚至还成为央行设定利率的重要参考指标。

显然,全面总结温州经济运行以及与之相契合的金融活动的规律,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部由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吴国联行长组织编撰,旨在反映温州金融业发展经验的《温州金融生态透析》便值得一读。多年来,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作为温州金融系统的领头羊,在贯彻货币政策、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完善金融服务、提高社会信用、沟通银政企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对一系列关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因此我相信,这样一项研究成果定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迪。

应吴国联行长盛情相约,写下以上文字,谈的只是些零星的体会,敬待方家指教。

2006年6月22日 于北京

引言:温州经济金融发展格局及启示

吴国联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依山傍海,北距杭州 400 公里,南离福州 350 公里,刚好处于我国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的交汇区域,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温州全辖陆地面积 11784 平方公里,辖 3 区 2 市(县级)6 个县,总人口 760 万。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温州的发展格局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但是,改革开放前,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当时的情况可以用“三少一差”来描述,即:1、耕地少。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不到 0.4 亩;2、国家投入少。温州在上世纪 50 年代是对台前线,60 年代是“文革”火线,70 年代是建设短线。建国后到 1981 年,国家对温州的总投入只有 6.5 亿元;3、资源利用少。温州资源贫乏,仅有的一点资源由于没有投入开发而不能有效利用。“一差”是指交通条件差。自古以来,由于温州交通闭塞,使温州话自成语系,外地人根本听不懂温州话,“汽车跳,温州到”是当年交通落后的真实写照。当年从温州到上海,乘海轮要 24 个小时,可谓“水路一条”(温州话的“水”字读音跟“死”字相同)。

对温州过去的落后面貌,老百姓记忆犹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平阳、文成、洞头均为温州下辖县)。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温州从实际出发,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富有区域经济特色的路子,使温州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温州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